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美」柯文著
雷颐 罗检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 东 主 编
周文彬 总策划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美」柯 文 著
雷 颐 罗 检 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 —1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1271-5

I. 在... II. ①柯... ②雷... ③罗... III. ①王韬—人物研究—中国②王韬—改革—思想评论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122 号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书 名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著 者 [美]柯文

译 者 雷 颐 罗检秋

责任编辑 王 楠 周文彬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71-5/G·316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序言

我的王韬传要出中文版了，这使我深感荣幸。然而，此书原文的出版毕竟距今已有近20年了，而书籍并非美酒，不一定愈陈愈醇。所以我觉得眼下重提此书时，有必要作某些分辩。

使这样做显得合乎情理的原因之一，与这部专著（共九章）的前八章所探讨的对象——王韬本人有关。王韬是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以及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虽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韬传记印行于世^①，但该书作者却未能接触到我所查阅过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于这些史料对了解王韬生平中许多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重要方面——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实质、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大有裨益，故此这些信息对中国读者似乎更有用处。

除此之外，在原书的最后一章，我力图探讨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它们关系到19—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虽说倘若今天重写此章，我会在结构上作部分调整，但这些问题本身对我来说却与20年前同样重要。的确，可以雄辩地说，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毛泽东之后四个现代化的领导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来影响已日渐开放，遂使这些问题比以前更加凸显出来了。

我先概述一下本书末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再说明若让我重写此章，我可能会作哪些修正。我所使用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前提：第一，广泛的文化变革一般都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阶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第二，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为两种判断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第三，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启动变革的重

^① 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阐明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的诸方面之后,我在这结论性的一章中从写个人传记转而写集体传记,探讨了12位开拓者的经历,其中8人(包括王韬)与沿海文化密切相关,而其余4人则是中国内陆的产物。

当初,我便公开承认这一构架“本质上是尝试和探索性的”,并对之作了许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与此书保持一定距离以后,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瑕疵所在,以及补救之方。我要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换句话说,我把变革过分地雷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过分地雷同于上述三个忽视或贬低了内在变化的论断;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即本书所谓“合法化”,又极易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中国化”(或反西方化);最后,我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对变革的阻碍,而几乎只盯住了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当然,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我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等,而更要紧的是,我将费点儿笔墨来说明——对这种变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跟在合法化外来变革时所产生的问题有何不同。例如,冯桂芬提出的改革中国地方政府的深远主张,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受到了内生的刺激;在把这种主张融入19世纪60—80年代的中国世界时,其遇到的障碍可以说不下于王韬之流在努力改革时所面临的障碍。^①但就王韬的情况而言,由于他的改革方案有那么多都反映了西方的影响,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碍本质上更多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而冯桂芬的障碍则更多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更充分地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与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本土的“被动变革”不同),自然会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使这种作用不大容易被说错。例如,重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在若干处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如果不是统统)归结于“西方的挑战”。除了从目前的观点出发我将尽力避开“挑战”这一术语外(因为它太

^① 冯桂芬的改革论文于1860—1861年写于上海,题为《校邠庐抗议》。由于文章十分激进,所以在他生前从未刊世。他死后其子仅印行了其中一些无关痛痒之作。直到1885年,即在篇文章写成1/4世纪后,才得以全部发表。也只有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激烈变革时,根据光绪皇帝本人的谕令,这部著作才在中国官员中被广为传播和研究。

基于主观的价值偏好),我还要在此指出更基本的一点,即中国所推行的受西方启示的变革(开始是在技术领域,但最终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常常被论证为一种防范战略,以阻挠部分或完全源于本土的更为根本——因此也更具威胁性——的变革,而且当改革的提倡者为政府成员或社会精英时,尤其如此。换句话说,与西方有关的变化在特定环境下亦能与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较为保守的力量联合。所以,并非仅因其受西方启发,就能保证它必然具备更为“激进”、“根本”或“威胁体制的”品格。

最后,也许从我刚才的几点陈述来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现在重写此书的最后一章,我将不会如此匆忙地否认沿海地区在20世纪后半叶仍是中国革新的主要源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策倾向的主要特点已经是向外部世界开放,而且其速度之快是在70年代初完成此书时难以想像的。虽不能说近年涌入中国的外来影响全都由沿海输入,但其中绝大部分却是这样;而且就对受外来启发的变革的接受性和容纳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广州这类沿海贸易集散地与辽阔的中国内陆之间,仍有巨大的反差。

由于同一原因,在毛泽东之后的岁月里,整合与接受由外来专利(尤其是西方专利)所引起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仍然受到一贯的重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力量。

虽说——而且部分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到了所有外来影响的冲击,深深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库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国辽阔的内陆地区和官僚部门,尤其是在形势危机时水流特别湍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不确定的“中国的”标准,外来观念可与之协商,但却不易与之聚合;同样,它还使深受外来观念影响的人在更为广大的中华世界中居于极端边缘和十分脆弱的地位。虽然这些受西方影响的个人的实际观念与一个世纪前的改革开拓者差别极大,但他们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诸如使自己在中国社会合法化,及他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合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韬及其同时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后一部分所探讨的主题无论多么幼稚,却仍可以说它并非只涉及了晚清,还更针对着中国历史的较晚阶段。

柯 文

1992年元月于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第一篇 一个新人的诞生 / 1

序 曲 / 1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 5

第二章 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 / 21

第三章 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 / 38

第二篇 新的世界图景 / 56

序 曲 / 56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 / 59

第五章 历史创造中的天与人 / 72

第三篇 为新中国开的药方 / 92

序 曲 / 92

第六章 教育改革 / 99

第七章 经济改革 / 118

第八章 政治改革 / 134

第四篇 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 151

序 曲 / 151

第九章 早期改革者与沿海 / 155

译后记 / 181

第一篇 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 曲

1894年早些时候，一个活跃而性急的年轻人，为了给这方土地上有实权的官员李鸿章上书宣传改良主张，从华南家乡出发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结识了一位颇为著名的主张改良的老者。这位老者帮他修饰上书，使之更易为人接受，又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这位年轻人便是孙中山，而本书的对象则是这位老者——王韬。^① 3

王韬的经历预示着孙中山一生的某些重要方面。他的著述可能已对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有着直接影响。^② 但1894年他们相逢的重要性却只有象征意义。前途无量的孙中山不久就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世界。而王韬却在度过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③，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于暗淡中溘然长逝。

在某种意义上说，“预料”变化便是促进变化，使之成为可能。在称之为革命的巨变能够发生之前，必须有一渐变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首次认真思考激烈变化的可能性。这便是中国19世纪后60年所发生的情况。无疑，这一阶段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模式仍一如既往。但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不断变化，却堪称为革命性的。 4

学者对19世纪中国的认知往往通过与明治的日本相比较而界定——更诱人的说法是被此限定而难以自拔。从日本“成功”之处出发，把晚清概括为“失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为停滞的化身而与“动态”的明治时代并肩而

① 有关王韬与孙中山会见的所有资料都来源于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版，第1卷，第28页。

② 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8卷本，上海，1957年版，第1卷，第27页。

③ 一些史料称王韬稍早些时候去世，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他是1897年去世的。

立。这种观点的麻烦之处在于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日两国在上世纪各自与西方相遇时,并无共同的出发点。跨文化比较是一桩扑朔迷离之事,对确认异同虽极有价值,但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变化速度)却颇有问题。现代化毕竟不是赛马。即便两种文化碰巧都处于“前现代”状况,也并没有共同的“基线”。

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 19 世纪中国的变化尺度是更恰当有效的方法。我们只有把 1900 年的中国与 1800—1840 年的中国作一比较,才能理解变化之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 1800—1840 年这一时期称之为“盛清”(High Ch'ing)的最后阶段。^① 在 19 世纪前期的中国,从观念和心理上说,英、法、美与中国的距离仍极遥远,这与罗马时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感觉一样。许多中国人(我指受到教育者)从未听说过这些国家。甚至几乎无人有这些国家位于地图何处的粗疏印象。如果中华帝国有任何人略知法国大革命或听说“震动全球的枪声”^②,他肯定是守口如瓶了。这些年中,中国与西方的惟一接触点是广州受管制的贸易。但与荷兰在长崎的贸易不同,在广州的接触并未成为西方思想影响的传输渠道。出于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无法得知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 19 世纪末,经历了四次对外战争、五次国内动乱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强加条约之后,这种骄傲与舒适的世界已被粉碎。但这可能并不是指外在的物质世界而言:可以想像一位来自鸦片战争前的访问者,如果他绕开受西方影响的沿海而专注于中国内陆,可能发现不了多少惊人的变异。阮元在 1900 年仍可幸存。巨变发生在中国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两三代人之前把中国学人禁锢于儒学天地中的无形栅栏此时首次暴露出来,随后经过许多痛苦的努力之后已被撬开。一种全新的宇宙观,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蜂拥而入。应该承认,在 1900 年确有不少有知识的中国人仍不知道英国的确切位置,犹如某些美国大学毕业生,在东南亚地图前指不出越南的位置一样。而英国与越南一样,却意味着与每人都密切相关之物。但毕竟有许多中国人,粗略地说在 1900 年有几万人,其世界观经中西交往 60 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孙中山不可能生活在 1800 年的中华世界。

同样,严复、康有为或梁启超也不能生活在那个世界。关键并不在于生活、写作在 1800 年之后的这些人碰巧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而在于他们处在

① 魏斐德:《盛清:1683—1839》,载《近代东亚:论文解释》,J·B·克罗里编,纽约,1970 年版,第 1~27 页。

② 爱默生描绘美国革命爆发的诗句。——译者注

从根本上说受到西方影响的历史之中。这一环境比其他一切更能把 1900 年的中国与 1800 年的中国区别开来。在 1800 年,中国人认为自身就是世界,认为可以环抱世界。直到 1840 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但到 1900 年这种感觉则消亡了。在这动荡的过渡年代,一种精神觉醒首先为某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和并非每一代人都能经历的大规模变化所激发。然后,一两个人便大胆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即从前任何一代均未经历过的。就像尼采笔下的疯人,在即将黎明的黑暗中提灯游荡,宣称“上帝已死”。开始,这些敏感人物并不能使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但随着时间流逝,疯人渐多。到 1900 年,人数已多到能谈论革命性变革而根本不被视为疯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对于这个文明的永久合理性,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未敢稍有怀疑,但它此时却陷于毁灭的边缘。

之所以说孙中山不可能生活于 1800 年,只是为了说明,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这是历史变迁进程的否定方面。就正面来说,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可能性。根据这种“代际逻辑”^①,孙中山在本世纪初之所想所做,部分是建筑在他的前辈当年所想所做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并非在不成熟的氛围中创造革命(事件)。实际上,在他出生之时(1866),中国已经孕育了革命(进程)。

但在王韬出生之时(1828)却并非如此。每一代都产生自己的新人。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更新程度却可能极不相同。人类从得到火车到拥有飞机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为了得到火车却费了几千年之久。相对于这个意义而言,由于王韬这一代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的中国,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孙中山更大。因为王韬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王韬和孙中山个人。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累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

的确,展望法到处可用。当我们从孙中山的观点来看王韬,我们的确会应用“有限的”、“并非很先进的”、“仍非常传统的”等词汇。但若我们从他的起始,即他出生时的中国来展望,王韬的创新性就会使我们印象深刻。这两种展望都是合法的,这取决于作者所写的书。本书所论是关于近代中国革命

^① 这是阿尔伯特·克里格的一段话。见他所著:《介绍:日本历史中的个性透视》,载《日本历史中的个性》,克里格与 D·H·沙文利编,伯克莱,1970 年版,第 10 页。

进程的“开端”，即开创阶段。因此本书的中心不在于王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于他怎样成为一个开创者。

第一章 早年在江苏

8

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在沿海的江苏省甫里镇,该镇位于苏州东南约50里处。王家在明代颇为兴旺,但当17世纪中叶与南侵的满洲军队激战时,家族成员被大肆杀戮,王家再无往昔的强盛了。待王韬出生时,已岌岌乎濒于破败。王韬的父母所生的前三个儿子,都是在出生后十天之内就患天花夭折。王韬是在他父母专门进香求愿之后,才来到人间的。^①

王韬成年后,仍深深地眷恋儿时情境,只要一有机会,就返乡探访。他最为留恋的是镇边的一座老庙,这里是欢庆新年的各种活动的汇集处。正像王韬晚年回忆的那样,此时这里钟鼓锣钹、唢呐笛声充耳不断;且有无休无止的戏剧和杂耍;在庙门外,卖玩具的小贩把各种玩具摆在两旁,琳琅满目。对甫里的孩子来说,这是最快活的时光。^②

大约3岁时,王韬的母亲就开始对他进行学前教育。她是第一个教王韬认字的人,每逢夏夜她总给王韬讲述古代名人的故事和言行,使漫长的夏夜充满温馨。这些故事使王韬深受感动,据王韬自己说,这亦使他在7岁左右就对中国的传说、笔记打下良好的基础。^③

王韬的父亲王昌桂以设馆授徒为生,教学生通过科考。当时的中国,只有涉身官场才能荣华富贵。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梦想进入官场,而通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考又是踏入仕途的主要门径,所以对能担负起学习的人来说,对经典和历史的训练及早就成为一桩严肃的人生事业。大约从七八岁始,到十几岁止,王韬一直在其父的严教下接受正式教育。无论王昌桂是在家还是在邻村或镇里设馆,王韬总是跟随其父。当后来他忙于事务少

^① 《菉园文录外编》,卷11,第16~17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编,台北,1962年版,62卷本,第9806~9807页。

^③ 《菉园文录外编》,卷11,第21页。

有时间学习、勤思时，曾感激地回想起正是这时为他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科考共分三级。王韬于1845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乡试)，主考官因其文有“奇气”而对他赞扬备至。^② 当上“秀才”之后，他也可跻身低层士绅之列。但按照正常程序，只有通过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第二级考试，他才能被任命为官员。

1846年王韬与他父亲一起去南京参加举人考试。但省试的竞争十分激烈，他终未获通过。虽然考试失败远不能证明天资低下——许多中国人都对此大持异议——但对考生的生活前程却立即有决定性的影响。通往仕途之门被暂时关闭，直到再次参加考试，才可能考虑人生选择。王韬与他父亲及处于此境中的其他人一样，选择了虽有荣誉却实惠不大的教书生涯。^③

科举失败给了王韬一个攻击这一“制度”的现成机会。1848年他在给好友和妻兄杨引傅的信中抱怨清朝承袭明代科举制，使应试士子只会写呆板僵化的“八股文”。这样，许多杰出之士皓首穷经仍黯淡无光，无法谋得一官半职。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人们以孝廉升迁，因此官吏廉洁、学者纯正，此种情况没有得到承继，并非没有人才，而在于选才机制的根本缺欠。从八股文怎么可能得到行政干才？^④

王韬对科举制度的攻击，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来看。当然，也可以简单地在表面价值上来理解。毕竟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中国人指出过这些方面。^⑤ 也可以将之说成是一个恃才傲物、雄心勃勃的青年人因自尊所作的忿忿不平的反应。这一制度既然未给他留一席之地，所以他也拒绝这一制度。第三种可能是，王韬在参加这次考试前已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他的失败仅仅是证实了他以前的观点。王韬后来力称他还在孩童时代，即憎恶八股文。^⑥ 更进一步的是，他不顾朋友要他再考一次的催促，坚持认为尚有光宗耀祖的其他更佳途径。^⑦

11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由于对科举取士制度取批判态度，王韬此时已部分地对现实不满了。在随后的年代，这些不满更为强烈。

①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9~10页。

②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6页。

③ 《漫游随录》，第9808~9809页。

④ 《弢园尺牍》，卷1，第18~20页。

⑤ 参见大卫·内文逊：《抗议成规与成规的抗议》，载《儒学功教》，芮玛丽编，斯坦福，1960年版，第177~201页。

⑥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17页。

⑦ 《弢园尺牍》，卷1，第18~20页；卷2，第8~9页；卷3，第9~11页。

1847年王韬的父亲到上海设馆授徒，翌年初春，王韬也赴沪探望父亲。在此之前，王韬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中国人的世界之中。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及其他几个沿海城市开口外贸——几乎没有打扰内地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在1848年，也无法得出这些将影响中国人生活的结论。因而，在王韬对跟西方人初次接触的描述中充满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就的确使人惊讶：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入其室中，缥緜插架，满目琳琅。麦君有二女，……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

《漫游随录》，第9809～9810页

在一首初至沪上的感怀诗中，王韬表露出一一种完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更可预料的感情。他对中英战争的失败和大批“蛮夷”聚集沪上经商深表忧虑，并鞭挞朝廷的求和政策，强调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国海防。^①

12

王韬对他所置身其中的上海氛围的种种反应，随时间发展而各不相同。前者是几年后的反应，而后者却是当下的反应。这种说法，对这种不对称现象其实只提供了部分的解释。而一个更为根本的解释是，这正是王韬的本性。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扮演了一系列使人惊讶的外在角色，而且还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这些往往发生着翻来覆去、使人错愕不已的迅速变化。

我们已对王韬青年时代外在生活的特点作了简单扫描，但他还有内在生活的一面。王韬告诉我们，在17岁到20岁之间，没有一夜他不做梦，梦见某些白天使他印象尤深的场景。大约在1849年春夏，这种夜间奇想突然停止，他在名为《华胥实录》的小书中追记了这些梦幻。但不幸的是，他的梦境日记从未出版，我们只能从他当时为此所撰之前言中略见一斑。他作了如下描写：

① 《蘅华馆诗录》，卷1，第19～20页；《瀛壖杂记》，卷5，第10～11页。

尝闻意之挚着，神或得而通之，神之注者，地不能以域之，此梦之所由来乎？且夫一往深者情耳，而缘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徇之不可，乃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如是即欲日求在梦中而不可得。何也？……故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

《弢园文录外编》，卷7，第29页

- 13 1849年夏，大约就在他写上述文字前后，王韬面临着他生活中的第一个真正危机——他的父亲死了。这使他必须立即承担供养母亲、兄弟、妻女的责任。对于像王韬这种经济状况的人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梦幻季节已经结束。当年秋天，王韬从前就认识的麦都思(D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聘请王韬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当中文编辑。王韬虽不甚情愿，但报酬优厚，仍得接受。^①

青春时代在上海

起初，王韬在上海的境况颇为凄惨。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并不是一座日后即将变成的令人激动的繁华大都市。而且，王韬居住的小屋紧邻城北郊的一片墓地，很难使他不被某种恐怖之感缠绕。^②

更严重的是，虽然王韬不久就搬到较好的环境中，并将家人接到上海，但随后又发生一场悲剧。1850年10月，王韬染病已久的娇妻回乡探亲后返沪才一周左右，病情突然恶化，终于不治。王韬悲痛已极。在包办婚姻时代，男女双方往往必须尽力改善并不匹配的关系，王韬与其妻子似乎就有深深的互相依赖之情。他悲痛欲绝地叹道：“苟逆知如此，何忍一日离之而他适哉？”他总认为自己移家上海对妻子的遽尔长逝负有部分责任，直到后来他再次结婚之后，这种阴郁的情绪仍在折磨着他。^③

王韬对墨海书馆的工作也时有抱怨。虽然实际由他执笔，但却受外国人

① 恒慕义编：《清季名人录》，卷2，第836页。

② 麦克里维，亨利：《王韬：一个过渡人物的生平与著述》，伦敦，1953年版，第5页；《弢园尺牍》，卷2，第1～2页；《瀛壖杂记》，卷1，第7页。

③ 《弢园文录外编》，卷11，第22～23页；《弢园尺牍》，卷2，第4页。

监督,终使中文被糟蹋得令人目不忍睹,恰如王韬所形象描绘的那样:“即使尼山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①而每日被人将其与看不上眼的外国人联系起来这一明显的事实,则比工作本身更令人恼怒。总有一天,像上海这样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口岸城市将产生一种全新的中-外文化,中国人将可以丝毫不丧失自尊感而与外国人一起密切工作。但在19世纪50年代,这还有待一段漫长的过程。此时像王韬这样向外国人“卖文”的文人,仍受他们同胞的怀疑和鄙视。

14

但为什么王韬还继续这一工作?显然,最重要的原因是金钱。在书馆所得报酬不仅有保障,而且数额之高是甫里的私塾先生所不敢企望的。^②另一原因,很可能是为外国人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王韬所描绘的那样枯燥。物质环境还是宜人的:“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③而且,王韬对他的雇主麦都思极有好感。论年齿,麦都思可算王韬的父辈,总在王韬需要安慰时给他以善意的慰藉(一些年后,当麦都思的死讯传到上海时,王韬悲痛万分,向一位朋友坦诚表示这是他觉得最为真挚亲切的一位西方人^④)。

有助于王韬忍受上海生活的最后一点,是他的中国朋友圈不断扩大。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在注重家庭的中心地位时,往往忽视朋友关系的重要性,而对中国的男性精英而言,这点尤为重要。不仅他们的事业使之时时离家,其业余时间往往也习惯在家庭以外度过。与他们的现代美国同行不同,这些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摆脱家庭束缚的可能,所以朋友关系和其他非家庭关系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放松的最基本渠道。

不久,王韬便发现满上海皆有他的同道。王韬的日记(大多是从1852年7月到1855年5月,为手稿^⑤)亦可极好地说明他是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并充分表明朋友对他的重要性:

15

六日甲寅:午后读《前汉书》。薄暮,正斋来舍,与之散步城隅至大境阁访壬叔……

十有八日丙申:午后至正斋舍,同往画舫轩啜茗……既别,经天主堂

① 《弢园尺牍》,卷2,第2页。

② 《弢园尺牍》,卷2,第11页;卷4,第6页。

③ 《漫游随录》,第9809页。

④ 《弢园尺牍》,卷3,第8页。

⑤ 这些日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中。《茗花庐日志》,1849年6月11日—22日;《茗萝寮日记》,1852年7月17日—10月12日;《瀛壖杂记》,1852年10月13日—1853年4月17日;《沪城闻见录》,1853年7月—9月;《瀛壖日志》,1853年4月18日—1854年1月29日;《蘅华馆日记》,1854年9月22日—1855年5月4日。